

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Faculty and Staff Union

團結 • Solidarity

自主 • Autonomy

公義 • Justice

工會聲明

浸會大學必須正式道歉，《香港藍皮書》必須收回， 薛鳳旋必須辭職 一評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對中文大學的道歉

引言

本月八日，本工會以《為了浸大的聲譽和尊嚴，浸大必須向中大道歉》為題，就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主編的《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2012)》對中文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作出失實指控發表聲明，要求校方立即向香港中文大學道歉。可惜的是，陳新滋校長稱要等調查小組完成調查後才可以考慮道歉，做法絕不合道理且欠缺誠意。作為一校之長，需要行事果斷和勇於擔當，才能減少今次事件對浸會大學校譽造成的傷害。

日前，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竟然在調查期間，不動聲息地在該所網頁偷偷「道歉」，連發佈聲明的日子都欠奉，實在教人大開眼界(1)。同時，該所以「疏忽」為由解釋今次事件，卻沒有說明具體情況和責任誰屬，未免混淆視聽。

我們強調並呼籲：

道歉必須真誠、調查必須認真、改過必須徹底、責任必須承擔

學術機構若發現旗下著作出錯，理應立即撤回，並盡速向所有受影響人士公開鄭重道歉。如今事件被發現兩個月，浸會大學及當代中國研究所或閃縮迴避或議而不決，不能解決問題，亦無法服眾。

《香港藍皮書》問題叢生，校方應全部收回

事件發生後，一些報刊已指出當代中國研究所出版的《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2012)》實在問題多多，而浸會大學學生會第四十五屆編輯委員會亦就《香港藍皮書》出版《號外：《藍皮書》假學術之名行赤化之實？要求薛教授公開交代，還浸大學術誠信》(2)，詳細分析《香港藍皮書》的種種問題。我們認為，該號外提出的質疑發人深省，校方必須嚴謹處理。

就此，本會重申並要求校方：

1. 以浸會大學名義立即向香港中文大學，尤其是中大的通識教育部公開道歉。
2. 以浸會大學名義立即向本校全體教職員、學生，校友及大學捐助者道歉。
3. 薛鳳旋教授應個人親自向本校全體教職員、學生，校友及大學捐助者道歉。
4. 校方應譴責該所所長薛鳳旋教授在今次事件違反學術操守，並向所有當代中國研究所捐助者公開鄭重道歉。
5. 薛鳳旋教授作為研究所所長難辭其咎，應辭去浸大一切職務，並公開向全體浸大師生交代此一事件。

6. 當代中國研究所必須全面收回市面上已流通的《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2012)》。
7. 校方調查小組應全面調查薛鳳旋教授所有違反學術操守的行為，包括今年中《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編寫出現的問題，以確保同類問題不再發生。
8. 調查小組及校方必須從速提議並訂立機制，保證學術自由免受政治干擾。
9. 從長遠計，陳校長應支持成立跨院校申訴機制。

我們繼續呼籲浸大教職員、學生，校友及捐款人士能夠向校方表達對事件的關注，積極捍衛本校的聲譽和學術尊嚴。

如有查詢，請與本會主席李建賢(9127 0653)或發言人杜耀明聯絡(9494 9422)。

特此聲明。

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理事會敬啟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廿二日

工會原聲明

http://eposting.hkbu.edu.hk/filepost/2012b/2012110923471_na.pdf

(1) 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道歉及澄清聲明

http://accsweb.hkbu.edu.hk/index.php?contentpage=news_page.php&news_pageid=500

(2)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第四十五屆編輯委員會

<http://www.facebook.com/45thSUEB>

編委號外！

《藍皮書》假學術之名行赤化之實？

要求薛教授公開交代，還浸大學術誠信

繼《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後，近日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再傳出《香港藍皮書》醜聞，嚴重影響了浸大校譽，同時削弱浸大學術公信力。《藍皮書》部分內容偏頗且具誤導性，有假學術自由之名，卻有被政治干預之嫌，令整個所謂「學術研究」可信性成疑。

我們相信，所謂學術自由，是能夠保證高等學府的教師和研究者不受內在或外在的壓力的情況下進行研究工作；學者也要負上學術道德的責任，不能因個人私利或政治利益而製造言論，因此校方絕不能以捍衛「學術自由」為名企圖免責，對這事毫不插手。

因此，本會強烈要求《香港藍皮書》主編薛鳳旋教授公開交待事件，並舉行公開討論會，與學界討論書中具有爭議性的內容，同時要求校方盡快公開事件調查小組成員名單，以確保調查獨立性。

《號外：《藍皮書》假學術之名行赤化之實？要求薛教授公開交代，還浸大學術誠信》網址
<http://issuu.com/45thsueb/docs/extral>

《藍皮書》假學術之名行赤化之實？ 要求薛教授公開交代，還浸大學術誠信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於 2012 年 6 月 28 日發表《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 (2012)·香港回歸 15 周年專輯》(以下簡稱《藍皮書》)，《藍皮書》由香港浸會大學地理學系講座教授及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薛鳳旋主編，分為三個主要部分，分別是「經濟與社會」、「政制發展和政府管治」，以及「結論與建議」。該書第 206 頁第 iii 點指：「在學科變動上，大學與中學被要求設立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擠壓和減少正當學科的教時外，實際上方便了大量西方普世價值侵入學校，例如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由美國一個基金贊助並協助撰寫教材，其教學方向實際上已由該基金主導。」該內容引起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以下簡稱中大通識教育部）的極大迴響。

中大通識教育部在 11 月 1 日發出嚴正聲明，指《藍皮書》中有關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一節，不盡不實，對香港中文大學的聲譽造成損害。聲明指《藍皮書》中「是不負責任的虛構陳述」。聲明中提到中大自 1963 年創校以來，則重視通識教育，當時成員書院主動開科，從未因「被要求」而設立。而為迎接三改四而新開設的「通識教育基礎課程」，是由中大校內資深教師組成工作小組，經過詳細研究和討論後提出，方案經中大校內通識教育委員會及常務委員會審定，然後交由教務會通過。《藍皮書》中所謂由「美國基金」主導，實為子虛烏有。

這次事件是當代中國研究所繼《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之後再一宗醜聞，嚴重影響了浸大校譽。然而，這次事件只是書中問題的冰山一角。《藍皮書》中尚有不少內容具誤導性。值得深思的是，這種素質的研究報告是否能夠容許存在在理應具有公信力的大學之內？浸大又是否應該繼續縱容這種違反實事求是原則的學術報告，置校譽於不顧？

《藍皮書》問題的癥結，不單是在誣衊中大一事上，縱觀全書多個部分，無不發現當中具有偏頗及誤導的內容，有違學術研究原則。並且，社會輿論質疑其「擁共」意味甚濃，浸大疑被統戰勢力入侵。

可信性成疑的學術研究

此書多次將個人的「意見」(opinions)以描繪「事實」(facts)的寫作方式呈現，使讀者容易將「意見」理解為「事實」，有混淆視聽、誤導讀者之嫌。《藍皮書》作為一份社會科學研究報告，當中的論斷卻欠缺足夠理據。如在指出「回歸後，特區政府有意將香港政治推向英式議會體制，傾向西方民主、人權等價值，為特區未來發展埋下不安定的伏筆」(P. 188)，然而文中卻未有明確指出當中指的是哪個「西方民主」的議會體制。由於不同的民主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形式各有不同，文中將眾多民主制度簡單歸類為「西方民主」，對此缺乏深入論述；再者，在描述 2012 年特首選舉競選後期的發展時，該文以「相比另外兩位候選人，民意還是比較偏向梁振英」(P. 187)作結，同樣未有詳細交待得出這結論的資料或數據。將本為個人見解的論述當

成事實演繹，很難不讓讀者「照單全收」，左右讀者判斷。

另外，《藍皮書》的內容不少偏頗失實。該書的立場明顯褒揚建制派，意圖貶低泛民政黨。例如於《政制發展和政府管治》中有關「政黨政治」的部分，在簡述各政黨背景時，指民建聯「雖然主要領導是香港傳統左派，實際上是代表香港整體的政黨」(P. 130)；而一些規模較小的反對黨「標榜年輕和激進，但現時仍處於崇尚口號、缺乏實幹的階段，雖然以代表市民和基層自許，但爭取到的支持似乎有限」(P. 146-147)；又武斷地將香港政黨簡單二分為「愛國陣營」(包括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等)和「反對派」(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前線、民協、職工盟、街工等)(P. 147)，誣衊一般泛民政黨成員不是愛國人士；並在描述香港選舉情況時，指「變相公投」「最終投票率低，卻諱敗為勝，激進政治勢力在3年間一發不可收拾，現有法律又缺乏制衡機制，民怨因而累積」(P. 183)。多個例子反映出該書明顯親建制，時時刻刻醜化泛民政黨的立場，為建制派作政治宣傳，並將個人對事態的感想當作公眾普遍的看法，誤導讀者。作為一份社會科學研究報告，卻缺乏嚴謹的研究精神，可信性有待商榷。

學術包裝下的擁共宣傳？

《藍皮書》多個部分的內容均挑戰了香港既有的核心價值，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原則。例如指出「回歸後，特區政府有意將香港政治推向英式議會體制，傾向西方民主、人權等價值，為特區未來發展埋下不安定的伏筆」，否定民主、人權等價值在香港重要的角色；在簡述立法會歷史時，則指「彭定康的主要遺害乃在1995年製造了一個近乎全面直選產生的立法會，打亂了人們對『一國兩制』及『行政主導』的理解」(P. 115)，當中不但沒有解釋「近乎全面直選產生的立法會」如何打亂了人們對「一國兩制」及「行政主導」的理解，同時給人抗拒議會全面直選的印象。然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原則正正賦予香港人基本的政治權利，同時確立自由、民主為香港發展的核心價值，所以當《藍皮書》質疑於香港更廣泛推動民主的同時，已經是在推翻香港一貫立身自處的根基。

於《香港政治社會經濟的問題及改善建議》一章中多處有關政制改革的建議同樣意圖否定香港三權分立政治體制之意義。例如指香港回歸以來「未讓有能力的愛國人士在參政上佔一定的比重」(P. 202)；提出香港政制體系中的常任秘書長需由中央政府任命及審批(P. 203)；建議透過通過「終極政制」，加強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民主成份，「保持直選與功能組別的均衡」(P. 203)，這間接承認香港議會制度無必要演化至全民直選，弱化立法會對施政的制衡力量；書中甚至倡議「全國人大全面研究《基本法》中不同的立法原意，並在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適當時間，主動釋法」(P. 203)，加強人大釋法，企圖強化中央對香港司法的影響。而「涉及重大公眾利益」、「適當時間」定義模糊，顯然是給予機會讓中央能在關鍵時刻干預香港獨立的司法制度。

《藍皮書》更單憑香港在經濟領域的成功就斷言「香港成功地落實了『一國兩制』」，卻對政制、司法等方面香港所遇到的問題隻字不提，沒將這些角度納入為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的考量中，評論因而變得片面。眾所周知，香港的政制改革多年來停滯不前，民主成份近年甚至有倒退之嫌，市民各方面的自由亦逐步被收窄，顯然是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則的衝擊；而獨立的司法制度亦因多次人大釋法而被削弱。試問對「一國兩制」有著如此的干犯，又怎談得上是「成功落實」？

種種建議都顯示此書正在鼓吹收緊「一國兩制」，以及現時港人在政治上的各項權利，漠視

「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原則。書中多次強調香港特區政府須以行政手段維護香港穩定，把議會反對施政直接醜化成製造混亂，破壞香港和平，明顯在否定三權互相制衡——立法、司法兩個機關對香港政策制訂、監察施政的重要性。

概括而言，《藍皮書》透過否定港英政府在政制上的發展的貢獻，並將這些港英時期建立的議會民主制度直接歸納為「香港的禍根」，並且一直在建議香港如何能在政治、社會等各方面能更配合內地國情和思維，從而加深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和控制，極具統戰意味。

假學術自由之名胡作非為？

據當代中國研究所網頁所載，其宗旨是成為浸大當代中國研究的軸心。為政府及其它機構提供政策研究、教育，及顧問諮詢等方面的服務，現今更已與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和福州等地的大學及研究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但當代中國研究所對於浸大來說究竟是甚麼？據筆者在浸大的網頁上的查探，未發現當代中國研究所隸屬浸大任何一個學術院系，換言之這是一間獨立的研究所，與大學教學及研究部門均無直接關係，縱使是與此同名的中國研究課程亦非用研究院的資源。而且，該院也並非以大學的研究資金作支持，是自負盈虧的機構，大學的資金運用及行政其實難以影響當代中國研究所，容易給其機會假學術自由之名來胡作非為。

所謂學術自由，是能夠保證高等學府的教師和研究者不受政治的、基督教會的或其他行政當局的組織、戒律或指令從事其工作，保證他們有機會單純地為了社會進步而發展出有益於社會的知識方面，其中包括外在的自由，即學者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沒有任何外來的影響或壓力干預；也包括內在的自由，即學者本身不會因怕受到監控而自我審查，而且對於同一個議題，學者應該以歡迎態度開放公開討論。對於學術觀點的自由辯論被認為是學術自由的重要體現。

然而，薛鳳旋教授已承認《藍皮書》是受中國國務院轄下的社會科學院委託，並由社會科學院提供資金出版。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所一直受左派人士歡迎，單是10月獲全國政協委員王惠貞和曾憲梓分別捐贈500萬和150萬元作撰寫《香港通史》和《藍皮書》的經費，這些研究難掩為金主賣廣告之嫌。而且，薛鳳旋教授曾連續三屆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在內地也曾歷任公職，如2000年至2005年間擔任廣東省省長顧問，1988年至今擔任深圳市政府城市規劃委員會顧問及福建省三明市政府城市規劃委員會顧問等。其豐富的政治經驗，難以為其學術研究的中立性護航，亦難免讓人覺得這本《藍皮書》有濃烈政治色彩。

加上由「中國模式」事件到而今爆發《藍皮書》爭議，話題中心人物薛鳳旋教授從不應邀出席公開諮詢或討論會，不會與學生一同討論其非主流學術觀點，又談何學術自由？

浸大學術公信力被削弱，令人痛心

最揪心的是當代中國研究所頭上頂著浸大的招牌。一所大學，有責任確保旗下的學術及研究組織秉持學術及言論自由的原則。大學應是培養獨立思想和批判思考的土壤，作為高等學術機構的頂峰，大學在社會上是有公信力的。一所好的大學應該嚴格地維護其學術誠信，至少不被政治勢力左右學術。而更重要的是，作為大學學者，應清楚這身份等同是倫理道德等高深學問的監護人，公眾會以一個大學教授作為真理的詮釋者，因此其言論對公眾對一議題的理解甚至可以有決定性的影響，故此，學者更加要負上學術道德的責任，不能因個人私利或政治利益而製造言論，治學應自覺地正直獨立，若明知有政治勢力影響自身對研究的判斷，便應該自覺地拒絕干預。若明知故犯，則嚴重違反了作為學者應有的操守，理應受到輿論甚至制度的批判

及懲治。若薛鳳旋教授明知《藍皮書》是中共統戰香港的工具，但也放之任之，大學理應解除其職務，才能維護大學在學術上的公信力，否則大學的誠信將受損。

然而，對於當代中國研究所《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學術獨立性備受外界抨擊，校長給予的回應竟只是「本著捍衛學術自由的重要原則，大學不能基於學者的政治或學術觀點而向學者施壓。當代中國研究所已發表了聲明，闡釋立場，我建議同學如有意見，可以學術討論的方式向當代中國研究所反映。」以捍衛學術自由為名企圖免責，未能為浸大的學術誠信聲譽護航。

在這裡，筆者想說的是捍衛學術自由並不是對這事毫不插手。當大學屬下機構的學術自由被侵犯，應予以重視及立刻展開調查，而不是置之不理，畢竟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也攸關浸大的聲譽及師生的利益。

浸大的名聲雖已受損，但在本月六日校方宣佈由副校長黃偉國領導調查小組，徹查事件有否違反學術原則。作為浸大學生，筆者希望調查小組的成員能具代表性和獨立性，最終能得出有公信力的結果。同時望薛鳳旋教授能與浸大學生公開會面，闡釋《藍皮書》內的政治觀點，接受同學的諮詢並以開放態度與公眾討論其學術觀點。若調查結果證實當代中國研究所以及薛教授主編的《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2012）·香港回歸15周年專輯》背後是有政治勢力在干預的話，薛教授理應辭任所長的職務以及正式向公眾道歉，以正浸大的名聲，釋除外界對浸大學術誠信的疑慮。

中國研究課程學會與當代中國研究所撇清關係

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成立背景提到：自九十年代以後，浸大已開設一些跨學科的當代中國本科課程，來自浸大商學院、社會科學院、傳理學院和理學院的學者均致力於當代中國的研究，可以說大學在過去多年來已積累了比較可觀的對當代中國教與學和研究的力量。為此，於二零零八年八月才在浸大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

外界經常都會以為中國研究課程（下稱「中研」）與當代中國研究所有莫大關聯，所以當代中國研究所爆出了兩次醜聞後，極大程度上影響了中研的形象。為此，我們採訪了中國研究課程學會幹事會主席邱緻莉。

邱同學稱，中研的行政方面，例如課程的管理及教材等與當代中國研究所並沒關係。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立場、出版及行動都不代表中研課程的立場。對於外界將當代中國研究所的負面印象投射到中研上，邱同學表示十分無奈。因為兩者皆為獨立機構，故中研不會且無法干涉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內部運作。她表示，在收集會員意見後，中國研究課程學會幹事會會按情況作出進一步行動，以維護中研形象。

最後，作為浸大學生，我們有以下的訴求：

- 1) 《藍皮書》主編薛鳳旋教授公開交待事件，包括提供《藍皮書》中有關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評論理據及其資料來源。
- 2) 《藍皮書》主編薛鳳旋教授舉行公開討論會，與學界討論書中具有爭議性的內容。
- 3) 校方盡快公開本事件調查小組成員名單。